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近日在广西调研时强调，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宝贵历史机遇。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深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大力推进改革创新，进一步兴起文化改革发展新高潮，不断开创文化改革发展新局面，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中宣部3月30日在京召开理论宣传工作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理论宣传就应深入一步。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按照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的总要求，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扩大影响力、增强说服力，更好地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统一思想，为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思想理论氛围。

科幻文学正悄然走出困境

以刘慈欣的《三体》、韩松的《地铁》和钱莉芳的《天命》为代表的一系列科幻小说在近两年引领了一个科幻文学阅读的热潮。最近，《人民文学》杂志在3月号上集中刊发了刘慈欣的4个短篇《微纪元》《诗云》《梦之海》和《赡养上帝》，这是《人民文学》在30多年前发表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之后，再一次关注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这一切都在说明，科幻文学正以它独特的魅力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

科幻文学的尴尬处境

科幻小说的身份一直以来都处于一种游离的状态。1978年，郑文光在一篇题为《应该精心培育科学文艺这株花》的文章中说到，包括科幻小说在内的科学文艺，科学界认为它是文艺作品，搞文艺的又认为它是科学，结果成了童话中的蝙蝠，既不是鸟也不是兽。后来，科幻小说慢慢地被接纳到文学的大家庭中，却又面临一个新的尴尬：传统文学认为它只是不入流的类型小说，类型小说又认为它是艰涩的科普作品，两边便宜都占不到。

吴岩《科幻文学论纲》书的第一章标题是“作为下等文学的科幻小说”，接受采访时，吴岩表示，科幻文学和科幻作家一直以来都是处于一种边缘的位置，所以才会起这么一个标题。“在上世纪80年代初，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等人都写出了非常优秀的科幻作品，也很畅销，但他们还是不断声称自己被边缘化了，没有被邀请参加纯文学创作的会议。”

到了现在，科幻小说家们的参照系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渴望被纳入一个所谓的“纯文学圈”里，而是希望自己的小说能够“大众化”、“商业化”。当然这种“大众化”、“商业化”并不是针对小说的质量而言，而是让科幻小说变得和其他类型小说一样，被更广泛的读者所接受。刘慈欣在谈到《三体》系列时说：“《三体》的销量肯定是可以的，但是我想指出一点，在当前的类型文学中，言情的、武侠的、官场的、惊悚的，哪一个类型里没有突破40万册的畅销书？惟独科幻小说没有。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初科幻作家对所谓的“纯文学圈”的向往，还是当前科幻作家对于类型小说畅销的羡慕，都反映出了科幻文学的一种边缘化处境。吴岩分析说，“为什么老一代的科幻作家觉得一定要进入纯文

学圈？因为纯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是那时候的主流。而为什么今天的科幻作家一定要进入畅销的行列？因为商业化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时候的主流。所以说，他们一直处于一种边缘的位置，并不断试图朝向主流进。”

“边缘的人永远希望成为主流，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吴岩表示，“难得可贵的是，这些科幻作家敢于直面自己的边缘处境，用一种边缘人的眼光，写出了一系列反映边缘价值观的优秀科幻作品，极大地拓展了科幻文学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科幻文学与传统文学并不冲突

《人民文学》刊发刘慈欣的小说，引起了媒体的热议。《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表示，媒体之所以纷纷来电问为什么我们会刊发刘慈欣的小说，大概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种“越界”的举动，越出了大家一向认为的“传统文学”或“纯文学”的边界，遂成新闻。

大家往往把所谓的传统文学和科幻文学的区别夸大了，好像它们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楚河汉界。实际上我们只有一种文学，只不过在这样一个文学的总体中存在着不同的写作方式，而各种文学创作向来都值得我们好好去关注。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文学”本身，而不是什么“传统文学”、“科幻文学”、“通俗文学”等，这些命名都应加以质疑。

谈到科幻文学的特殊性，李敬泽认为，科幻文学从科学的角度对宇宙和人类的可能性进行探索，展现出一种丰富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我们很难想象，一种没有科幻想象力的文明，会真正地在当今这场世界性的竞争中取得优势。”李敬泽说，他在关注中国的科幻文学，刘慈欣、韩松等人的作品他都在看。他认为30多年来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些优秀的科幻小说家，可以到世界性的平台上参与想象力的竞争”。

韩松认为，《人民文学》杂志刊载刘慈欣的小说，对于科幻文学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科幻文学以前面临太多的误解，认为它不能很好地反映现实、反映深刻的命题，但实际上科幻文学一直以来都跟现实保持着特别紧密的联系，注重反映现实生活中最令人纠结的尖锐问题，因此“科幻就是最大的现实主义”。科幻小说家常常把人物放到一个极端的时空环境中进行一种思想实验，进而把一些残酷的东西给表现出来了，而这些东西正好是跟我们现实生活最为接近的。

在《地铁》中，韩松把主人公放到“地铁迷宫”中，让他遭遇了一系列的奇观，以探索个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出路问题。

“我们国家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中，科幻文学就是对这个进程的反映，它关注技术和城市发展带给我们的影响，充满了对未来的担忧。传统文学大多是以乡土和历史为题材，因而科幻文学的这种题材取向就具有了独特的意义。”韩松说，“我的小说始终想表达这样一个主题：对中国未来的担忧。因为我是记者，中国大部分地方我都去过，发现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有时候会用一种居安思危的心态去想，中国未来的发展动力会在何处。科幻文学应该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不确定性作出一个预警，所以科幻文学又被称为警示文学。”巧合的是，韩松《2066之西行漫记》中关于世贸中心大楼被炸、全球金融体系崩溃等的描写，都被现实所发生的一一应证了。

本报去年曾刊发了王德威的演讲长文《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从鲁迅到刘慈欣》，其中说：“阅读刘慈欣、韩松等人的科幻小说让我觉得，我们应该持续地来想象中国文学在各个文类、各种创作方式上所可能展现的新意。”现在确实是重新认识科幻文学价值的时候了，《南方文坛》杂志曾刊登过一系列关于“当下中国的科幻文学”的论文，颇为引人注目。

科幻文学如何吸引更多读者

在《三体》系列中，刘慈欣以华丽的笔法描述了人类文明和三体文明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整部小说贯穿着一个“黑暗森林法则”：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潜行于林间，他必须小心，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潜行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消灭它。刘慈欣认为，在传统小说叙事中一个人的道德往往是相对固定的，而在科幻小说中试图阐明，“人类的价值观和道德是随着世界的设定而不断变化的，这也许更符合我们真实的人类历史”。按照当前“硬科幻”和“软科幻”的分类，刘慈欣的《三体》无疑是一部硬科幻，而硬科幻一般会因其复杂的科学和理论阐述而难以被普通读者接受，但是《三体》系列却是近些年最畅销的科幻小说。

刘慈欣说，他自己就是个科幻迷，所以他主要是为科幻迷而写作。但在写《三体》系

列的前两本时，他还是多少考虑到科幻迷之外的读者共同的欣赏趣味，结果反响还不错。到了第三部，他觉得系列书籍一般是越写越糟，成功的可能性不大，那就干脆专门为科幻迷写作就算了。于是《三体3·死神永生》就回到那种比较“纯科幻”的路子了，结果反而成为第三部赢得了科幻圈以外的读者认可。刘慈欣因此感慨：“科幻文学坚持自己的理念是没错的！如果不坚持而去迎合读者，你不但把科幻的东西给丢了，也争取不到读者。这说明，科幻美学在中国是能够引起共鸣的，不光是在科幻迷里，而且还可以蔓延到普通读者中。”

坚守“科幻”的理念，才能保持住这种文类的独立性，但是科幻作家们在写作的过程中考虑到读者障碍的问题也是有必要的。钱莉芳说，她一直以来都喜欢阅读通俗小说，在写作中不知不觉就往那个方向偏了。在《天命》中，她比较注意设置悬念，在人物塑造上下工夫，保持语句的“舒适度”。她认为，小说本来就是一种通俗化的文学体裁，天生就该“伺候”读者，而不是让读者来将就。若作冷艳高贵，偶一为之可能觉得新鲜，时间一长，读者肯定不买账。科幻小说也是小说，带个“科”字已经够小众了，若也玩这一手，简直就是慢性自杀。当被问到这样是否会影响到作者的独立表达时，钱莉芳说：“写小说就是一种跟读者交流的方式，你要表达自己的观点，也要让别人乐于倾听，这是需要兼顾的。换句话说，尽可能用别人能接受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独立思考。”

在《三体》之后，科幻文学的出版状况变得相对乐观，这是否能够带动科幻文学真正走向繁荣呢？韩松说，科幻文学之所以在国内无法形成一个热潮，原因在于我们缺乏一种热爱科学、科幻的文化氛围。所以，我们的科幻作者和科幻作品并不是特别多。但是相信“80后”、“90后”的科幻作家会写出一批杰出的作品，因为他们大都是在城市的翻新和信息的轰炸中成长起来的，没有农业文明的包袱。吴岩认为，从世界性的未来趋势来看，科幻文学已经基本上走完了历史进程。因为现在科技对未来的推进已经不在远方而是无限接近于现实，所以原有的科幻文学已经不足以表达这复杂的社会现实。但我们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有着多元的现实，所以在中国还会有一个科幻文学的余波，甚至有些外国研究者认为中国是科幻文学的下一个增长点。

(黄尚恩)

绎，成为北京人艺和观众心目中一个永恒的经典。如今，戏中所描述的故事背景和内容已经不再让观众感到陌生，但是如何能把一出地地道道的美国戏改编成中国戏，而且符合现代观众的欣赏习惯呢？“我们一直重视打造出一种中国味儿，我在思考一种味道或者说一种气质——中国的气质，把这种气质带到戏中，让这个戏演出来就是中国的戏。由于我本人对戏曲的喜爱，我从戏曲中找到了很多依据和可能性。”因此，戏曲元素、中国气质，成为李六乙创作的出发点。

没有美国式的写实布景，更没有年代感十足的服装，《推销员之死》的环境都是借助灯光的变换完成的，年代感十足的舞美设计成为演出的一大特色。而该剧最大的成功还在于演员精确、真诚的表演。一会儿真实，一会儿虚幻，威利·洛曼的精神空间随时跳转，而通过舞台展示出来的则是一次次物理空间的转移。演员们在舞台上的演出充满张力，流畅自如。无论是丁志诚对人物丰富心理世界的准确把握，还是卢芳、荆浩、苗驰等年轻演员所体现出来的情感力度，都使整个演出给人以真诚与角色“无缝对接”之感。始终将人作为表现对象，用真诚打动观众，使新版《推销员之死》赢得了观众的好评。据悉，该剧演出将持续到4月19日。

唐师曾 摄

物风韵和色彩斑斓的戏曲服饰的精髓。陈平的山水、梅、竹枝等题材的水墨作品53幅。展演期间，国家大剧院还将上演南宋戏文《张协状元》和陈平编剧的《画梦诗魂》《富春梦》等3部昆曲作品，这些作品均由少非执导。

长期从事舞台美术创作和戏曲动

画教学工作的于少非在油画作品中注

重刻画人物的细微神情，试图传达人

物的神韵。

此次展演将持续至4月13日。

为农民工架起文化的桥梁

本报讯 3月31日，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宣教部、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中共河南省周口市委和农民日报社社共同举办的“加快推进中国农民工文化建设研讨会”在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云其木格，中宣部原常务副部长、中国扶贫委员会主任徐惟诚，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倪健民，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组书记何建明等出席研讨会。研讨会由农民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唐园生主持。

何建明在会上谈到，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农民工的生活是独特的，也是具有强烈的时代的。他们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游移、对故土的依恋、简单的生活节奏和复杂的心路历程，都可以绽放出绚丽的文学之花。农民工群体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文学精神。他们为广大作家提供了创作的灵感与营养，而且这个群体中不少人本身就具有活跃、质朴、新鲜的文学细胞，正在慢慢成长为一支重要的文学力量。

何建明说，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下属的作家出版社半个多世纪以来推出了大量关于“三农”题材的精品力作。近日推出的杨成军的诗集，正是这位农民工诗人为理想打拼的成果。随着农民工队伍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这个群体一定还会不断涌现出文学新锐，创作出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也将倾力投入热情，致力于扶持农民工文学新人的工作。

与会人士认为，加快推进我国农民工文化建设，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保障农民工文化权益、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需要，也是城市自身文化建设、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做好农民工文化权益保障和文化服务，不但可以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和融入城市，也会让一部分返回乡村的农民工成为有开阔眼界和较高人文素质、科技知识的现代新型农民，这对于推进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此，专家呼吁尽快形成相对完善的“政府主导、企业共建、社会参与”的农民工文化工作机制，建立相对稳定的农民工文化经费保障机制，切实推动现有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向农民工开放，鼓励用工企业和农民工集中居住的社区积极开展面向农民工的文化活动，用文化为农民工架起一座融入城市的桥梁。

研讨会上，文学艺术界人士发出了建立“中国农民工文化研究会”的倡议，呼吁开展对农民工文化的研究、普及、辅导和培训，科学、全面地加强农民工文化建设。

“娇子·未来大家top20”在京颁奖

本报讯(记者 王宽) 由人民文学杂志社和盛大文学主办的“娇子·未来大家top20”评选活动日前落下帷幕，并于3月31日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颁奖典礼。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和部分活动评委为获奖者颁奖。冯唐、张悦然、笛安、乔叶、鲁敏、盛可以、魏微、葛亮、朱文颖、李浩、王十月、唐家三少、蔡骏、颜歌、计文君、滕肖澜、吕蔚、路内、阿乙和张楚等青年作家位列其中，阿乙同时被评为年度青年作家，杨庆祥被评为年度青年批评家。

“娇子·未来大家top20”评选活动历时一年，通过网络投票和专家评选，最终推举出了具有创作前景与实力的20位新锐小说家，表达了主办方对不同类型文学作者的鼓励与期待，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颁奖典礼后举行了主题为“青年的写作：局限与创新”的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4月1日，与会者还同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就“走向未来的文学”这一主题进行了研讨。大家谈到，中国文学正不断涌现出新的作家和新的因素，这批年轻的作者也带来了新的经验和对文学更为宽阔多样的理解，展现出中国文学新的活力。文学必须具有面向未来的向度，必须以宽阔的视野认识时代发展为中国文学提供的巨大的可能性。此次活动是对文学新生力量的一次有力推动，回应了中国文学在繁荣发展中的不断探索与创新。据悉，《人民文学》还将推出“娇子·未来大家”专号，将20位作家的作品呈现给读者。

北京门头沟区成立诗歌学会

本报讯 门头沟区位于北京西部山区，不仅自然风景如诗如画，历史文化底蕴也十分深厚，颇得历代文人墨客的青睐。3月29日，北京门头沟诗歌学会正式成立。北京市作协秘书长王升山和门头沟区副区长洪家志共同为门头沟诗歌学会揭牌。门头沟诗歌学会会长马淑琴在成立仪式上致辞。艾克拜尔·米吉提、李小雨、吴思敬、任洪渊等参加了仪式。

当天还举行了大峪中学分校诗歌特色学校创办两周年诗歌活动。这所位于门头沟的初中学校多年来重视诗歌教育教学，组建学生诗社，创办学生诗刊，还设置了4个诗歌特色班，被北京市作协命名为“北京诗歌特色学校”。在这场题为“春天与诗的约会”的诵诗会上，诗歌特色学校的师生和门头沟诗歌学会的会员一起登台朗诵，博得了阵阵掌声。



七届二次全委会召开

《我的唐山》 书写两岸血脉联系

本报讯 3月30日，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联合主办的林那北长篇小说《我的唐山》研讨会在京举行。李敬泽、张胜友、雷达、谢冕、胡平、梁鸿、吴秉杰、包明德、何镇邦、施战军、孟繁华等围绕小说的思想艺术价值进行深入研讨。

“唐山”是其原指的“大唐江山”的简称，也是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对故土的称呼。而大陆移民到台湾开基，则被称为“唐山过台湾”，两岸先民筚路蓝缕，台湾开基，有着割不断的血脉渊源，这是一段极恢弘并值得重墨书写的史话。林那北的《我的唐山》通过一对貌合神离的兄弟和两个性情迥异的女子之间的悲欢离合，展现了“唐山过台湾”这一段斑驳、丰饶而波澜起伏的历史画卷，是中国第一部再现该段历史的长篇小说。

与会者认为，《我的唐山》写的是一个戏班子及其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融入了“唐山过台湾”的历史大背景。作者将宏大的视野和细腻的笔触结合起来，表现了先民们“唐山过台湾”过程的艰辛及其他们之间的情义，展现了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血脉联系。小说糅合民间习俗、宗教文化、地方口语等元素，体现出鲜明的“闽台味”，暗含着一种抹不去的“乡愁”。(黄尚恩)